

小时候,一到过年,我们一帮淘小子最爱围着看村里杀年猪,因为不但有杀猪菜吃,还有“球”踢。

球不是真球,是猪尿泡。猪尿泡就是猪的膀胱,可以充气成球。新鲜的猪尿泡壁厚且韧,根本吹不动,除非用打气筒充气。杀猪的有招儿,他们把猪尿泡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擀,擀得柔软了,再吹就不费力气了。膨胀起来的猪尿泡很像气球,但球壁粗糙且血管的纹路清晰可见,不如气球光滑。猪尿泡球结实耐踢,一脚踢上去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仿佛要炸裂了一样。

东北的腊月天,天寒地冻,北风凛冽,穿着臃肿的我们,踢着猪尿泡球在雪地里奔跑,一会儿羊剪绒棉帽上就结了霜,大棉袄捋开了怀,棉手闷子丢得东一只西一只……快乐可以抵御寒冷,雪地里一只滚来滚去的猪尿泡球会让我们忘记一切。

女孩子也有收获,她们会收集猪的膝盖骨做成“嘎拉哈”,三五个人围在一起款嘎拉哈玩。“嘎拉哈”是东北话,其实就是羊拐,用羊的膝盖骨做的最好,猪膝盖骨稍大,手小的女孩子很难一手抓起四只来。猪骨往往被染

童年快乐并不贵

高自发

成红色,四只猪骨配一个花布口袋,就是一副嘎拉哈,好看又好玩,是女孩子们的宝贝。我们男孩子玩腻了踢球、打仗的游戏,偶尔也跟女孩子一起款嘎拉哈。

嘎拉哈的玩法不一,我们那里都是“款”。一个嘎拉哈六个面,两头儿圆而不规则,立不住,剩下四个面分别叫珍儿、背儿、坑儿、肚儿。款嘎拉哈时,先把四个嘎拉哈撒下去,一只手把口袋扔起来,迅速把不同面儿的嘎拉哈扳成一个面儿,回头还得接得住口袋,手还不能碰到别的嘎拉哈,最后一把抓起四只面儿相同的嘎拉哈,就算赢一局。接不住口袋或动了别的嘎拉哈,就失去一次款嘎拉哈的机会。如此几次,看哪一方款的次数多,谁就最终赢得胜利。

记得有回冬天,不知是在谁家的炕上款嘎拉哈,因为用力过猛,我的中指里插进一根竹刺,疼得嗷嗷直叫。那时农村的火炕都铺着竹编的炕席,难免会有不安

分的竹刺“旁逸斜出”。吃一堑长一智,以后再款嘎拉哈就在竹席上铺块布。后来经济条件好了,家家炕上都铺了地板革,隔凉隔潮比竹席强,款嘎拉哈再也不扎手了。

童年的快乐真的很便宜,一个猪尿泡和几块猪骨头就可以让我们的童年变得绚烂多彩。知天命之年时,再回忆儿时的快乐,忽然觉得所谓的“便宜”,不过是物

件儿便宜罢了。因为彼时人们根本不吃猪尿泡,啃掉肉的猪骨更不值钱,哪有现在的玩具动辄成百上千那么贵?

童年玩乐的物件儿虽便宜,但快乐的内涵却很昂贵,至少从今天的视角看来,贵到再也找不到,无论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了。有人说,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“得不到”和“已失去”,童年的快乐已然失去,要想再得到它,唯一的方法是葆有一颗童心,比如陪着孩子荡秋千、坐旋转木马,甚至是围着看蚂蚁上树,重温儿时放肆而又了无牵挂的快乐。

说起露天电影,40岁以上的人肯定会打开记忆的匣子。那时候,在农村,人人拿着小板凳到现场观看,甚至兴起了跨村看电影。一开始,很多村连电都没有,放电影的人都带着发电机。每当他们启动发电机时,旁边都围满了小孩,大家期待着发电成功,期待着电影马上开始。

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,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任何一场露天电影。一看到流动放映员进村,村里的孩子们就撒起了欢儿,奔走相告,“今晚放电影了,放《少林寺》”。笔者也曾是奔跑少年中的一员,一边气喘吁吁用水瓢喝着水缸里的水,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放电影的来了,早吃饭,去占地方。”

等待夕阳落山的时光是最痛苦的,小伙伴们常常梦想让太阳早点回家,梦想那发电机的轰鸣声早点到来。大家一遍遍地跑到发电机的位置,催促着放映员赶紧发电。当放映员抽出胶片的一头,放到一个空盘上时,真正的快乐就开始了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说说笑笑,难得在农忙之余聊聊家常。看完电影,大家还意犹未尽,男孩子学着电影中的武术动作,猴拳、醉拳、五郎八卦棍,以便在与小朋友对垒时一招制敌。记得冬天时,姐姐给我织了一副露着手套的手套,像极了猴拳中拳师用的那副,于是我走路几乎都是猴跳状,还不时用蜷缩的手指遮挡在眼前。

当电视进入普通百姓家后,露天电影渐渐没有了市场。从此,晚饭后大家不再有所期待,而是安安静静待在家里,等候电视剧的播出。但那种露天电影的情结,却深深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。

“五一”假期,听说有露天电影在济南阳光100凤凰街播放,赶紧过去一观,久违的白布银幕上放着《独行月球》。好家伙,现场黑压压一大片人,很多人还带着小孩。一位带着女儿的男子说,自己已经是第二次前来观看了,因为女儿喜欢看。

能不喜欢吗?无拘无束,周围热闹非凡,没有影院的黑漆漆,想笑就笑,想看就看,想走就走,这是一种观影的自由。更重要的是,来看露天电影的人,好多都是周围的邻居,平常见不着面的人挨在一起看电影,顿时熟络起来。

人是一种特别的动物,总是在回忆过去的美好,而露天电影代表了很多人人儿时最美的记忆。当下的城市生活中,需要通过这种文化形式让居民走出家门,也让社区更有集体的概念和意识。希望久违的露天电影,能给孩子们一个充满集体意识的童年。

久违的露天电影

李培乐

桐荫墨趣

竹篾子

李新宇



上篇说过,篾子在字典中是竹席之意,而在我们山东老家,却是这种盛器。篾子与篮子一样有两种:一是树条子编的,二是竹丝编

的。前者粗犷而粗糙,后者细密又细致。竹篾子可以盛比较细小的东西,比如晒枸杞、晒花椒、晒葵花籽,就需要这种细密的竹篾子。

想把菜烧得好吃又健康,是件不容易的事。靠多放油和增鲜剂,那

进口味

牧徐徐

不算本事。用母亲的话说,那只是“进口味”好,实则不健康,也称不上真正的美味。有一次,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去春游,中午在农庄里自己做饭,有位爸爸主动要求当“主厨”,他浇油下盐

放调料时既猛又狠。孩子们吃得非常开心,家长们也点赞,说“进口味”搞得很好。

很多人判断一道菜好不好吃,都是从“进口味”上去考量的。至于它们的本味应该是什么样子,是否健康,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这就是现实的无奈。

网络新词语

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

赵超

“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”是一种幽默、反讽的说法,形容一种无需付出感情、精力和金钱的陪伴方式。该句中的“陪伴”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陪伴,它强

调的是一种表面上的陪伴,存在即可,而不需要投入实质性的精力和付出。比如在男女恋爱或陪朋友出门时用到这个词,就是指自己单纯陪伴,一分钱不花。

告记者使秘。……免进餐,不进酒,但吸纸烟,且吃且谈旧京学生界轶事,关于恋爱者大半,因不觉眉飞色舞,如逢故人。”

而另一著名编辑,时任北平《实报半月刊》总编辑之管翼贤则云:“他的身躯不及四尺,他的态度却极其洒脱,面庞是白质如玉,仪容温婉如好女。我心里想,我假若有一位妹妹,一准要介绍给潘先生做一个朋友。……他平日在家,必定要穿一件修短适度的长衫,出门还要套上一件马褂,就是三伏天,也是这样打扮,有人笑他是迂儒,是学究,他的回答是‘出门如见大宾’六字。”

其风流倜傥中又不失传统束缚之仪态,从以上二人笔下可见一斑。其小说在当年既新潮又传统的“旧瓶装新酒”模式亦可从其仪态装束中得以体现。

小说创作使鬼公成为名人,在众多学校的盛邀下,20世纪30年代初期,他接连执教于济南大学与中法大学国文系,专授中国传统诗词,并自著《玄隐庐诗集》,被吴宓收入《空轩诗语》中。1931

年他与沽上文人士姚灵犀合编《天津半月刊》合订本,后遭诬入狱,由北平解往沈阳受审,后经人代为剖白而获释,于狱中著有《南冠草》一卷。除诗词外,其书法造诣也深,曾撰有《中国书法简论》上下两卷。他夫人周竟因慕其字而恋其人,嫁给鬼公后,整日临其字,以至后来有人求字,鬼公因事忙,概由其夫人捉刀。作为文人的鬼公,举凡当时文人雅好,他均染指,故同辈人对其有如下评论:其生平艺事,为一书法,二诗,三文,四小说,五鉴赏。可见其虽以小说起家,但后来的字、诗、文等均更上一筹,可谓那个年代一典型文人矣。

文人自有文人性,那便是狂。篆刻大家陈巨来曾将鬼公列为“十大狂人”之一:“他为人作书写扇,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,己名高高在前者,亦狂态耳。”掌故大家郑逸梅在《艺林散叶》中亦云:“潘伯鹰有狂人之号,有以所刊之诗集贻彼者,往往鄙薄之,或垫砚,或揩笔。”据传他曾为自己书房题字曰:“不读五千卷书者,不得入此室。”

五十五、刘弗祺旧居

《格蕾丝: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》,讲述了美国少女格蕾丝·狄凡因嫁给一位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中国,并在这里度过40年漫长岁月的真实往事。这个人(中国留学生)就是刘弗祺,天津供水事业的开创者。

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岩介绍:“刘弗祺家是陕西的。他15岁考入清华学校,毕业到美国留学。”在纽约,刘弗祺结识了他的人生伴侣,格蕾丝·狄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怀揣救国之志,刘弗祺回到祖国。1934年,格蕾丝带着18个月大的女儿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。她的目的地正是中国北方一座正在步入现代化的城市——天津。

“天津是全国城市中,继上海之后最早通自来水的。最早英租界开始通水,深井



刘弗祺旧居

水作为水源。再有一个就是天津永安自来水公司,取水点选到了南运河边上。”刘海岩说。正是永安自来水公司将刘弗祺请到天津,聘任他为公司总工程师。在天津,刘弗祺作出将自来水通至全城的规划,但这个计划却因利润不丰被一再搁置。

刘海岩说:“1949年的4月,负责市政建设的一个领导,亲自拜访刘弗祺。通过刘弗祺,政府和永安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反复协商,到了1950年3月,两大公司合并,成立了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。”刘弗祺带领新公司,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工程。

1953年,天津市自来水管网工程的第一、改建、扩建计划全部实现,为天津人民建成了一整套现代化自来水设备。任职给水排水设计院后,刘弗祺又率团队赴西北地区勘测,寻找长期可靠的水源,埋藏多年的健康隐患却在这时发展为癌症。1955年9月1日,年仅50岁的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
胡炳垠 撰文



解说词

刘弗祺燃尽了他短暂却灿烂的一生。

格蕾丝与孩子们继续在天津生活近20年。1974年下半年回到美国。刘弗祺的生活点滴,和他曾为天津、乃至中国水利事业所立下的卓越功勋,则都留在了妻子的日记与信件中。半个世纪后,正是以这些文字为线索,天津文史爱好者张翔找到了刘弗祺在天津五大道的居所,“这栋小楼,是刘弗祺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天津居住的地方。”张翔说。

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十二、鬼公其人其貌

关于鬼公其人其貌,20世纪30年代天津著名副刊编辑吴秋尘曾有如下描述:“名小说家鬼公与记者为神交。通信已半载,初不相识也。日者鬼公自关外来,过津北上,过画楼(《北洋画报》社)四次,不遇,终邂逅于紫竹林宴厅。鬼公衣二蓝汉瓦当文缎袍,玄褂革履,发甚亮,鼻架近视镜,无所谓名风恶习,极似一由留学生演进之官僚,语音娓娓可听,操燕青官话,盖皖人也,与吾友名记者张友鸾颇相似。性豪爽,于不说客气中可见。自谓写小说,不过自娱,初不贾名,故向不以真名姓示人,并